

瓷器概述



3
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翻印

一九七六年七月

一、绪 论

瓷器是我国劳动人民的重大发明之一，它与我们祖先许多不朽的光辉成就中的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的发明一样，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瓷器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与人们生活就更具有密切的关系，瓷器首先是为我国人民所发明和使用，然后才传播到世界各国，因而，在世界上获得了“瓷国”的光荣称号。

我国瓷器在世界上具有很高的声望。远在唐代中国瓷器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与海路销往海外，传播到世界各国。首先传播到朝鲜、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还传播到遥远的非洲，如埃及、摩洛哥、索马里、桑给巴尔、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噶尼喀等许多非洲国家。发现中国瓷器的地方，还不限于东非和北非，而且包括了西非，近年来在刚果境内也发现了中国的瓷片。

在著名的埃及古城福斯特废墟里发现了中国唐代越窑与邢窑的瓷片，唐三彩瓷片也有发现，在印度古城废墟里，也发现了邢、越二窑的残片，在日本仁和寺古庙宇中还收藏有完整的越窑瓷器。

多年来，在印尼、新加坡、婆罗洲等地先后发现有宋代青白瓷（影青）标本甚多。

土耳其伊斯坦堡博物馆及伊朗德黑兰著名寺院里还收藏有不少当时输出的我国元代青花瓷器，这些青花瓷器非常精细，这样的青花瓷器在我国也还不很多。

在上述的许多非洲国家里，都发现有我国的龙泉青瓷，也有青花瓷器。这些都足以说明，我国瓷器从唐代一直到明末清初不断地向世界各国传播，可看出瓷器在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起了重要作用。

在古代，其他国家来我国学习烧窑的也很多，早在五代后梁贞明时期，我国的烧瓷方法首先传播到高丽。南宋嘉定十六

年(公元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随来中国,在福建学烧瓷器的方法,回国后依法烧器,日本人称其为“陶祖”。欧洲学烧瓷器始自十五世纪我国成化年间,他们是间接的学自阿拉伯的。因此,日本、朝鲜、越南等这些国家烧的古代瓷器在造型、纹饰等方面都在好多地方学习我国,他们瓷器的风格由于受我们的影响有很多相同之处,以致有些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瓷器有许多鉴赏家看不出来,而误以为是我国的瓷器,当然我国的瓷器由于大量销往海外也吸收了许多外来的因素,如我国唐代的风头壶的作法和一些元、明时期的许多造型纹饰等。这些都说明我国瓷器对人类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也可以从瓷器上看到当时中外文化方面的交流。

我们在今天研究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历史往来时,瓷器也是一个重要的友好象征。因为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历史上的友好往来,必定会给我们留下考古学上的物证,瓷器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瓷器还有一个特点,它与丝绸不同,丝绸容易腐烂不易保存,瓷器就是用破了,也还有碎片的存在。有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名叫惠勒,他说:“十世纪以后的坦噶尼噶地下埋藏的历史,就是用中国瓷器写成的。”因为一九五五年前后在那里做过考古调查,曾发现有五六十处古代遗址中都有中国瓷器。也有一些非洲国家的古代遗址中,由于发现了中国瓷器,用中国瓷器来代表证明他们遗址的时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夏鼐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的题目就是《作为古代中外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说明我国瓷器对研究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历史的重要性。

瓷器在我国考古学上也是很重要的。只要我们掌握了中国瓷器发展的历史规律,了解到各个时期瓷器发展的各个阶段以及各时期的瓷器的造型与纹饰特征,它就能帮助我们断定遗址和墓葬的时代。有些遗址和墓葬,没有具体的年代记载可寻,在这种情况下,陶瓷器就显得重要了。因为每个遗址与墓葬出土物一般说来陶瓷器是很多的,就是对一些具体年代的墓葬,也能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如墓是否完整,有没有破坏过,是否有晚期墓葬的混入,如果早期墓葬发现较晚的陶瓷器,说

明该墓可能混进了其它较晚的墓葬，也可能是盗墓的人带进去的等。

由于我国瓷器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声誉，今天我们如何继承传统，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搞好现代的陶瓷器的生产，促进我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同样的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瓷器？瓷的定义是什么？

关于瓷的定义，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大家所一致公认的定义，但是有这样几条是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习惯采用的，也是在一般瓷书中常常看到的有这样几条：

1、它的胎质必须是高岭土或瓷土（原料），这是瓷的根本的东西，一般陶器为粘土；

2、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基本烧结，火候达到 1300°C 左右，一般陶器最高温度达到 $700-900^{\circ}\text{C}$ ，有的可能到 1000°C ；

3、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叩之发出清脆的金属声，一般陶器具有吸水性，叩之声音不脆；

4、器物表面施有高温下烧成的玻璃质釉，一般陶器没有釉或施有低温釉。

除以上四条外，还有两条：

5、胎质要白（白度）

6、胎质具有透明或半透明（透明度）

这六条是一般谈瓷器者所采用的，但学术界用前四条较多，认为只要符合前四条的器物，应当够上了瓷器的标准，至于五六两条是表示更高一级的瓷器。如果全用六条来衡量我国古代瓷器的话，那只有宋代景德镇的影青和明、清时代的瓷器才够得上。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对古代瓷器强调白度与透明度更是错误的。因为还迎合了外国资产阶级对于瓷器的定义，把中国瓷器的出现时间往后拉，我们当然不能同意。瓷器是我国发明的，应当由我们来给它科学的划出阶段，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当然我们应当给它一个科学的名称，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外国人说我们陶瓷不分，那是胡说。陶器、瓷器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当然有些是被一些学者搞乱了，如半

陶半瓷的说法，前一些时候很流行，在一些文章里和发掘报告里都能找到，这种半陶半瓷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瓷器它有一个发展过程，故一般认为符合前四条的还不具备后两条的我们虽然称之为瓷，但认为它还处在早期阶段，或者说是低级阶段。因此，给它一种新的名称，叫做“早期瓷器”，表示出它还带有一定的原始性，是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产物。

我国瓷器起源于何时？这个问题是研究瓷器发展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看法很不一致，诸如：陶器是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和人民定居生活上的需要而产生的。这在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伟大的祖先就开始用手制造了极其精美的“彩陶”，随后又发现了在轮上制胚、烧制出规整而薄、表面打磨光滑的各种陶器，充分显示出原始人们的高度智慧和伟大创造。据考古资料证明，商代制陶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从器物的表面打磨光亮到出了一层薄层的带光泽的玻璃质的东西，我们通常称之为“釉”，而这种带釉器物经过化验证明，它的温度很高，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很弱或不吸水，胎质化学组成已接近于瓷器，说明其胎质已经接近瓷器而不是一般粘土。

多年来，浙江古越州一带曾经出土不少带釉的器物碎片，说明产量还是很大的。河南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了这类器物，西周的葬墓出土的就更多。江苏、安徽、河南、陕西以及最近在甘肃也有出土。对这些商周出土的古釉器物，就成为学术界不单是个定名问题，而关系到我国瓷器的起源问题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多年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用科学的方法，对商周出土器物进行了化验，并且对我国原始社会的陶器和明清时代的瓷器也进行了化验和对比研究，达到更能说明问题。这项工作虽然做得还不够，但也能说明问题。对陕西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青釉器物化验结果证明，它的烧成温度很高，达到 1200°C 左右，吸水性很弱，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但内含较多的 TiO_2 和 Fe_2O_3 ，又是在弱还原焰中

烧成，因而胎或灰色，薄层不透光，尚不能完全符合一般人所承认的瓷的定义。根据这样的化验结果，把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青釉器物定名为“釉陶”，但又承认这些釉陶具备了一些瓷器的特征这样一种结论。这个结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学术界是基本上同意的。

现在，由于出土文物的增多，商代青釉器物的出土，特别是西周墓出土的就更多。河南洛阳出土的西周青釉器物，在质量上又有很大提高，出土的一种撇口罐，大到一尺以上，青釉布满全身，说明这时烧窑技术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因此，主张把这些墓出土的青釉器物定名“原始瓷器”的人多起来了，故将河南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尊定名为原始瓷尊。

根据科学方法化验的结果，对我国瓷器起源的问题，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其一，认为我国瓷器是从东汉末期至魏晋时期开始，把东汉至魏晋时期的青釉器物定名为“早期瓷器”，而把商周时期的青釉器物定名为“釉陶”；把这一段时期看成是由陶到瓷的过渡，看成是一个发展过程。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承认商周时期的青釉器物接近瓷器或者说它们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但还不能算是瓷器。最近《文物》第七期冯先铭同志写的《我国陶瓷发展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青釉尊认为还是定名“釉陶”为宜。

其二，根据化验结果，认为我国瓷器应当从商周时期开始，把商周时期的青釉器物定为“原始瓷器”，把这一段时期看成是瓷器发展的原始阶段。对魏晋时期的青釉器物亦称之为“早期瓷器”。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商周时期青釉器物，根据科学分析，既然已接近或具备了瓷器的某些特征，那就应当是瓷器，不能说它不是瓷器，只能说它还处在原始阶段。因此，应当定为“原始瓷器”。同时进一步认为，既然它们已接近瓷器，那它们与陶器就有了较大的不同（胎、釉原料不同，温度高低不同，物理性能不同等）、相反的与瓷器却有很大的相同。它们是接近瓷器多呢？还是接近陶器多呢？根据科学化验结果证明，虽然它们接近瓷器多。因此，它们应当是瓷而不是陶。

以上对中国瓷器的起源问题，虽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类青釉器物却认为是从南方印纹硬陶（不带釉，胎质坚硬，火候较高1200℃左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认为它是瓷器的前身。因此，这种青釉器物是南方烧制的，经过科学分析的结果证明，它们的胎质与浙江地区的早期越窑的胎较为接近。

由于目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故仅能作这样的介绍。

关于瓷器与陶器的关系问题，看法也不大相同，广义讲，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而来的，这样的说法，一般是大家所承认的。这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的，一是从它们的工艺过程来看，如对原料的处理，作胚成型，上釉，入窑烧制等都是相同的，后者是从前者学来的；一是由于陶器和瓷器都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它们的用途相同，因此，瓷器的造型也是从陶器演变而来的。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可以说没有陶器的发明与发展就不可能有瓷器，瓷器是陶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两者又是不相同的。虽然瓷器是从陶器发展起来，但陶与瓷也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严格说起来，陶是不能发展为瓷的，因为陶瓷的质地不同（原料不同）陶器以粘土作原料，瓷器以高岭土或瓷土为原料，制陶器的粘土在高温下也不可能烧出瓷器来。

自从瓷器出现以后，陶器还是在继续生产，不是一有了瓷器就代替了陶器，而是分成两条线各自向前发展，有些地方由于自然条件所决定，陶器至今在人们的生活中还占有很大比重。

二、中国瓷器发展的基本概况

（一）由陶到瓷的过渡（商—汉）

远在六千多年的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将陶器的表面打磨得非常光滑，并且有的陶器加上各种彩绘，龙山文化的黑陶表

面打磨得更加光亮，有的黑如漆，这样做的目的——是美观，二是为了实用，这时期由于发明了轮制，器体都很规整，胎体很薄，可见他们的制胎成型、施彩、打光的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到了商代制陶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标志表现在器物的表面从打磨光亮到出现了薄而一层带玻璃质的光亮面，我们通常把这种玻璃质的光亮面称之为“釉”。釉的发明和使用，无疑是这时期制陶业的一个巨大成就，也是在由陶到瓷发展过渡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的带玻璃质的青瓷器物，胎质坚硬，说明它的烧成温度已很高了。这种青釉器物在郑州二里岗上、下层中都有发现，一种大口尊，胎近似高岭土，紫褐色，器里通体都看一层淡黄绿色的薄釉，它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征，到了西周又有很大进步，施釉技术有显著提高，胎质灰白，器形也比较丰富，产量也比较大，据考古资料证明，分布地区较广泛如江苏丹徒烟墩山，吴县的五峰山、安徽的屯溪，河南洛阳金村、庞家沟，陕西西安张家坡，甘肃灵台等地都有大量出土。屯溪西周墓一次出土七十一件之多，器型有尊、豆、罍、提梁壶等，形制丰富，纹饰种类多。洛阳西周墓出土的亦很多，器型有罍、豆、壶、甗等，大罐高达二尺以上，施满釉，釉色青绿，瓷质坚不吸水，胎灰白。这批器物与屯溪的相比，其造型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洛阳的以光素为主，胎质较屯溪的好，屯溪的有纹饰的居多，灵台的类似洛阳，但釉和胎结合得不够好，故有剥釉现象，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器物，经过化学分析，证明其温度已达 1200°C 左右，胎已基本烧结，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由此可以说明这类青釉器物从商代出现以后，就得到了很大发展，无论是造型、胎质、施釉技术等各个方面都较商代有很大的提高。因此，我们今天在黄河中流、长江下游这一广大地区都有发现。

战国时期这种青釉瓷器物在西周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如长江中下游一带战国墓出土的大批这类器物，胎质细而坚硬，器形规整，火候很高，与青瓷在许多方面自相似之处，但在技术上还不如魏晋时期，显然还处在较原始的阶段，器形

多仿青铜器的式样，如提梁壶、三尺盖顶、彝、匜与整套的编钟等²。在江苏境内的春秋战国时代的遗址与墓葬中也出土了大批这类青釉器物，而且常常与几何印纹陶同时出土。在苏州、无锡一带亦有这种情况，在上海金山县也是如此。这些器物的胎质灰白，火候均高，施釉较均匀，釉色青绿和黄绿色。到了汉代，浙江占越州的这类青釉器物胎质更加细腻，这时期墓葬出土物较多。我们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加以排比研究，可以看出这类青釉器物，从商代出现以后，经过周、战国到汉的一千六七百年间的大体由陶到瓷的演变过程，为以后青瓷器烧成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 青瓷的普遍生产及其重要意义(魏晋南北朝)

无数考古资料证明，我国瓷器要数青瓷为最早，而这种青瓷都是在商周青釉器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谈中国瓷器的发展史时，首先谈到的就是青瓷。魏晋时期的青瓷与商周时期的青釉器物相比，就有了较大的提高。胎质细腻而洁白，瓷化程度高，不吸水，施釉均匀，光亮润泽，器形规整，纹饰也很精致，因此，人们称之为“青瓷”。

烧制青瓷的窑址，建国以来在浙江、江苏、福建、四川四个省十二个县市都有发现，以浙江为集中。在浙江的窑址有：

(1) 萧山窑：解放后新发现，浙江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都进行过调查，共发现窑址群三处。一在进化区，遗物堆积丰富，有印纹硬陶和早期瓷器的标本；一在戴村区上盖村，器物有网纹铺首四系壶、鸡头壶、灯、砚台及碗等器物，带印纹的标本不多。一在石盖村，与上盖村不及一公里，遗物器形、釉色基本相同。窑址的时代为东晋时期。

(2) 上虞窑：解放后新发现的窑址，浙江文管会进行过调查。窑址在白官镇、王家埠、华山、石浦、荷花湖、皂湖、茶山嘴及穿笔山等地，标本有常见的折沿洗、熊足砚、辟邪、各式碗以及带系的壶等，纹饰有划花水波纹、莲瓣纹、网纹等。窑址的时代为魏晋。

(3) 余姚窑：上林湖溪湖一带，窑址多数为唐。五代到北宋初期，新发现的蟹唇山窑址揭示了早期越窑的面貌。标本中印纹水盂的形制与大兴四年墓（公元321年）所出者完全一样。窑址的时代为东晋。

(4) 丽水吕步坑窑：窑址下层遗物多双系壶，造型与浙江地区南朝墓出土的青瓷大体相同。

(5) 金华五朱堂窑：遗物中有青釉褐斑标本。窑址的时代为东晋。

(6) 临海五孔窑：遗物多各式碗，里外施青釉，特征与吴兴捶铃山窑有相似之处。时代稍晚，相当于南朝后期。

(7) 永嘉夏壁山窑：遗物多青釉无纹饰，有带褐斑的标本。窑址时代为东晋。

(8) 德清窑：抗战前发现，遗物有青瓷和黑瓷两类标本。为浙江地区发现的十处魏晋南北朝时期窑址中唯一烧黑瓷窑。黑釉鸡斗壶与杭州东晋兴宁二年墓所出者相同。青釉褐斑器盖也与南京永和元年、四年的墓所出者一样，说明其窑址时代为东晋。

(9) 鄞县小市窑：遗物以碗为主，时代为东晋南朝。

(10) 绍兴下蒲西窑：遗物多印带状网及铺首衔环纹饰，窑址时代为西晋时期。

江苏只发现宜兴均山窑一处，遗物有壶、罐及碗，器物多带印花网纹装饰，具有西晋时期的特征。

四川发现三处：

(1) 新津县玉泉观：遗物多为碗，碗形深而口内欹，小小的，具西晋的特征。

(2) 邛崃县固驿镇：遗物有四系扁口壶及碗等。

(3) 成都市青羊宫：遗物多四系扁口壶，形制同固驿镇窑。

以上三处窑址的时代都属南朝，与四川地区南朝墓出土青瓷的特征相同。

福建省只发现一处，在福州市郊区建新公社怀安的天山马岭。遗物有壶、碗、罐等标本。与福州地区南朝墓出土物具有相同的特征，窑的时代应是南朝。

以上这些青瓷窑址的发现与调查，说明魏晋时期青瓷生产的普遍性，为以后各地瓷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窑址的调查与墓葬的清理是研究陶瓷发展史的两个重要方面，窑址调查解决墓葬出土物与传世品的烧制地点及窑口问题，墓葬的清理也是解决窑址时代的重要依据，尤其是一些带有具体墓志年号的墓就更为重要了。魏晋时期的墓葬出土物也是十分丰富的，有具体年号的墓也不少，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瓷器的分期与断代提供了大量资料。

墓葬以江苏、浙江为最多，湖南、四川、福建、广东次之，南京为六朝以来的重要城市与都城所在地，故六朝墓葬很多，十几年来出土的青瓷数以千计，完整精美的器物很多，重要的发现有赵士冈东吴墓出土的青瓷虎子，由于器身刻着“赤乌十四年（251年）会稽上虞师表宜造”十四字铭文，不仅标明了这件虎子的绝对烧制时间，而且也是带纪年铭文最早的一件，清凉山的另一座吴墓中，所出的一付熊灯的器底下刻有“甘露元年造”（公元265年）铭文，墓里出土了一对完整无损的青瓷羊，釉色青绿，器身划刻纹饰，反映出了五世纪中期的青瓷烧制水平，南京带纪年墓葬还很多，出土遗物也非常丰富，经过对它们的排比研究，使我们对这一时期青瓷的发展，器物的特征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浙江这时期的墓葬以黄岩最为集中，仅1956年即发现了五十二座，出土青瓷达一百二十件，其中带纪年铭的墓也有很多，从吴天竺元年（276年）直到大明六年（462年）等共有十九座之多，为六朝瓷器的断代，特别是南朝的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湖南省发现的六朝墓葬也很多，青瓷的出土也不少，带具体年号墓葬也为数不少，出土青瓷虽然有个时代的风格，如造形纹饰釉色等，但有的器物与江浙地区有些不同，富有湖南地区的特色。

福建省带纪年号的墓有宋、元嘉、大明、齐永明、建武及梁天监等出土青瓷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有些器物在浙江地区很少发现如一种插物器等。

四川省发现的六朝墓以昭化、彭明、成都较多，出土的青瓷很可能是四川地区烧的，预计除新津窑址外，今后在四川境内还会发现六朝时期的窑址。

广东、江西两省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瓷也不少，大体可看出两省早期青瓷的一些面貌，广东省发现的六朝墓葬以广州市较多，曲江及韶关也有少量发现，江西则在南昌、浚江、奉新及永津等地发现，南朝墓出土的青瓷盘较多，盘上多雕或浅刻莲瓣纹，莲心又多印莲实纹，这种窑过去曾有人认为是唐代洪州窑，这些盘在这些墓葬出土之后改变了看法，是南朝时期的遗物。

北朝时的墓葬不多，出土青瓷也少，一九四八年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了一批北朝青瓷，因此，揭开了北方青瓷的序幕，值得注意的是，类似封氏墓出土的仰覆莲花尊的器物，解放后在湖北又陆续发现四件，其中两件形式与封氏墓出土的基本相同，但器形要小些，另两件在主要纹饰特征上也是一样的，这又为我们研究北方青瓷提供了新的资料。

我们从上述地区的墓葬出土的青瓷来看，数量是很大的，与前期墓葬有较大的不同，出土物青瓷增多，青铜器减少，有的墓几乎很少有铜器。可看出这时青瓷有逐渐取铜器地位而代之的趋势。青瓷的烧成与普通生产的主要成就，也是我国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三）青瓷的继续生产 白瓷的烧成及其重要意义

白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问题已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工作所解决。一九七一年，河南省博物馆在河南安阳发掘了一座北齐武平六年（公元575年）的范粹墓，该墓出土的瓷器共十三件，其中白釉瓷器有十件，胎质细腻，有带彩者三件，釉色白或呈乳白色，可看出白瓷出现的初期产品。到了隋代，白瓷烧成了如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和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无论胎质或是釉色均较前者有很大的进步。白瓷的烧成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它标志着我

国瓷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为以后彩色瓷器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器龙柄鸡首壶，在形制上还保留着南朝青瓷鸡头壶的式样，但却换上了白色的新装。另一件白瓷双龙柄双联瓶，形制精美，也是隋代瓷器的一个创新品种。唐代白瓷双龙柄瓶，可看出就是从它发展而来的。此墓除白瓷以外，还出土一些青瓷，其中有八系、六系、四系、三系各种青瓷器，有青瓷盘口双系壶、青瓷盂罐、青瓷小扁平等，都是较为精细的作品。此墓为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是一座青瓷与白瓷同时出土，发现最早的一个墓，同时也代表了隋代烧瓷较高水平的一斑，是我们研究隋代瓷器的重要资料。

隋代的瓷器生产是处在上继南北朝，下承唐代的重要阶段，是从青瓷发展到白瓷的过渡时期。隋代虽在我国瓷史上是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却起了一个推陈出新的和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但过去由于对隋瓷不认识，不是把它往上划到南北朝，就是往下列入唐代瓷器的范畴，因此产生了一种重唐轻隋的偏见。自从一九二九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遗址中，发现了仁寿三年（公元603年）墓志的隋墓一座，在墓中出了几件青瓷，隋瓷的面貌才初步被揭示出来。后又在山东曲阜、河北景县先后出土了不少隋瓷。解放以来，在西安除出土隋代青瓷以外，还出土了精制的白瓷。更重要的是在湖南长沙、湖北武昌又陆续出土了器身印有各种花纹装饰的青瓷。再一方面，在河南、河北、安徽、四川等地不断发现隋瓷的窑址，这就为进一步研究隋瓷的烧造技术与窑址的分布提供了科学根据。于是隋瓷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改变了对隋瓷的看法。

隋代的青瓷窑址发现了许多处，并且进行了调查，但白瓷窑址未被发现。在西安隋代的白瓷出土较多，因此今后在陕西境内发现隋代瓷窑址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唐代瓷器在隋代瓷器的基础上又有了较大的发展，隋代白瓷烧成后，青瓷还在继续生产。到了唐代，青白瓷出现了并驾齐驱的局面，这就是一般说的我国瓷器史上的两大瓷系。南方的越窑青瓷与北方的邢窑白瓷是唐代两个最著名的瓷窑，也是

唐代青瓷与白瓷的优秀代表。我们在唐代文人的诗篇中都能找到当时赞美这两个窑的诗句。

全唐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形容越窑瓷器的颜色是多么的美丽。

唐李肇国史补：“内丘白瓷瓿，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说的是邢窑白瓷是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物了。这个天下可能是泛指，不仅国内而且也包括国外。上面我们谈到在许多国家的古代遗址中，都发现有唐代邢窑白瓷与越窑青瓷，就说明了这一点。

又如在段安节·乐府杂录上说：唐·大中初有一个调音律官，郭道源“善击瓿，率以邢瓿。越瓿共十二只，旋如减水于其中，以筋击之，其音妙于方响”。这说明了两窑的胎质都是坚緻的，因而能发出清脆的音律来。

邢窑遗址至今未发现。西安、洛阳唐墓中出土了不少胎质洁白的瓷器，一般都认为是邢窑，这个问题还有待今后来解决。

除上述唐代越窑与邢窑，一青一白两个主要代表外，烧制青瓷的窑据《茶经》记载还有：

鼎州窑：在陕西泾阳（未发现）

婺州窑：在浙江金华

岳州窑：在湖南湘阴，已调查证实，长沙出土物很多。

寿州窑：在安徽凤阳，已发现窑址。

洪州窑：在江西南昌（未发现）有人说在景德镇不妥。

发现唐代烧青瓷的窑址重要的还有陕西秋州窑，湖南长沙窑，四川邛窑，温州西山窑，景德镇石虎湾梅亭窑等。

烧制白瓷的窑还有四川的大邑窑，在唐代著名的诗人杜甫的诗中提到它：“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颈胜鬃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如大邑窑果真如此，水平那是非常高的，但到目前为止，窑址一直未发现。

河南巩县窑：以产白瓷为主，唐书和元和郡县志两书提到河南贡白瓷，经过调查证实，巩县的白瓷窑，是当时的贡瓷产地，在唐大明窑的废墟里，找到了不少碎白瓷标本，更加以证实。

河北曲阳的定窑，经调查证实，唐代已开始烧制白瓷，它是宋代定窑的前身。

五代时期，由于吴越钱鏐家族的统治的苏南、浙江境内比较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吴越钱氏为维护自己的统治，不断向中原地区的各王朝进贡，越窑瓷器是当时的主要贡物之一，关于吴越钱氏向中原各王朝进贡的文献记载很多，在天宝、太平兴国时期曾九次向宋朝贡，其中瓷器一项数量就达21万件以上，另一方面当时海外贸易也不断扩大，瓷器出口的数量也很大，因此，五代时期的越窑在唐代越窑的基础上又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除了在上林湖一带烧窑外，还建立了许多新窑，经过调查证实，上虞窑、寺前窑、鄞县窑与上林湖越窑在造形纹饰、胎质等方面都基本相同，说明越窑器物的生产除余姚上林湖一带以外，上虞窑、寺前窑和鄞县窑也生产越器。

五代时期，北方许多瓷窑因战争的破坏，大多数已经废弃，有的虽然仍在生产，但数量与质量显著下降，因此，只有南方的越窑代表了五代时期瓷器生产水平，当时越窑的造型精巧，形制优美，花纹精细，可说是南方青瓷的最高水平代表。

五代时期的白瓷，解放以来也出土过一些，数量虽说不算很多，但也能看出它的发展水平，较集中地出于湖南长沙的五代墓中，胎质洁白，形制精巧，但烧白瓷的窑址未发现，有待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这时期的烧窑成就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对五代瓷器没有认识，过去一般不是往往把它放入唐瓷的范畴，就是往下误认为宋瓷，目前虽然五代墓葬出土的瓷器不多，但经过排比、研究，已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重宋轻五代的眼光。

(四) 各地瓷窑的大量兴起与宋代几个著名窑系的形成

宋代是我国瓷器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南北各地瓷窑大量兴起，是这时期我国瓷器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从建国以来新发现的瓷窑就达数百座之多。据文献记载，各地还有许多瓷窑尚待今后的发现，现在已发现的窑址，在南方大部分集中在浙

江、江西、福建、广东，在北方主要集中在河南。从我们现在发现的与调查过的宋代瓷窑来看，绝大多数文献都有记载，多数窑址调查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相符，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古代窑址的文献记载绝大多数是可信的。但在前一段的瓷器考古工作中，都是先发现了窑址以后才去找文献，看看文献里有没有记载。最近《文物》第五期，冯先铭同志写了一篇文章，从文献记载里找出有古代瓷窑的遗址，提出线索，供各地同志在考古工作中注意关于古瓷窑的问题，我看是必要的。现在我们虽然发现的瓷窑不少，但据文献记载来看，各地瓷窑还有很多未发现的，摆在我们面前瓷器考古工作的任务是很大的，说明我们对宋代瓷器的研究还很不够，今后的研究任务还很重。

一般谈宋代瓷窑的发展时，首先提到的就是所谓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

汝窑：在河南临汝，因地处汝州而得名。汝窑烧制青瓷是继越窑而发展起来的。北宋后期为宫廷烧造瓷器，器光素无纹饰，这种器物俗称之为汝窑，现在传世的不很多，因此非常名贵。汝窑特点：釉极光润，有细密的皱纹，制作精巧，底足满釉，支钉很细小，圈足微外卷，造型受越窑的影响。另一种民间用瓷，器里多印花，现在一般称临汝窑。所谓五大名窑之一的汝窑，是指专为宫廷烧制的瓷器。临汝窑受汝州窑影响很大，以印花为主，以盘碗为主，其它器物很少，质地和色彩都不如汝州窑，印花纹饰也不清晰，胎较汝州窑稍厚。

官窑：是继汝窑之后为宫廷烧造的一个纯粹官办瓷窑。官窑分为北宋官与南宋官两种。北宋官设于汴梁（开封），南宋官设于临安（杭州），汴梁城北宋时期可能因黄河泛滥而淹没，窑址未发现。南宋官窑遗址在杭州乌龟山，业经中外人士作过多次调查而证实。官窑釉质润厚，南宋时已极珍贵，现在传世的不多。

哥窑：据文献记载：汝窑具有章生、章生二兄弟二人各主一窑，兄所烧者称“哥窑”。器以釉有纹片为其特征。纹片的形成是胎与釉收缩率不同的结果。差误大则纹片细碎，差误

小则纹片大。这原是一种弊病，但人为的掌握了这一规律，成为一种瓷器的特殊装饰艺术。哥窑的窑址还未发现，烧制地点也不能肯定。经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化验结果，说哥窑胎质接近江西景德镇的宋代“仿哥”器物。因此认为哥窑很可能是景德镇烧制的。现在哥窑的问题，看起来比较多。哥窑纹片较官窑小，釉光润，制作规矩，小碎支钉，口与足有所谓紫口铁足的特色。

定窑：在河北的曲阳县，因当时地属定州而得名。定窑继唐五代而发展，以烧白瓷为主，此外还烧黑釉、绿釉色瓷。一般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器多印花、划花、刻花，纹饰图案丰实，以印花为最美，全器布满花纹，布局严谨，纹饰清晰，线条有力，为宋瓷装饰中非常成功的一种方法。大概政和年间（公元一一一〇至一一一七年）一度烧官窑所使用的瓷器，后因有缺陷（口上无釉）而为汝窑所接替。定窑的特点，胎白坚硬，釉白中闪黄，文献里讲，釉有泪痕是它的特点（流釉现象），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定窑多数没有泪痕，以印花为主，烧法是反过来的，因此口上无釉。

钧窑：在河南禹县，因当时地属钧州而得名。钧窑在历史上第一次烧成紫红釉，是钧窑制瓷工匠的一大贡献，红是铜的呈色，这在古代科学不发达的情况下，烧出这种釉是很不容易的。钧窑的特点，釉色带有红色斑片，颜色有玫瑰紫与月白釉两种，制作精巧，釉厚底不流，支钉规矩，文献里讲，有一种蚯蚓走泥纹，是它的特征。

除了这五大名窑之外，这个时期南方还有着名的龙泉窑，北方有汝州窑、磁州窑等。

龙泉窑址在浙江龙泉县，是继五代越窑发展起来的。是宋代南方最著名的名窑之一。

汝州窑遗址是在陕西的铜川市的黄堡镇。调查证明从唐代开始烧瓷，宋代得到很大发展，是以刻花青瓷为其代表，遗址散布非常广大，遗物非常丰富，是宋代北方著名的青瓷产地。

器物以刻花为主，线条明快有力，花纹清晰流畅，胎质细腻，都较临汝窑为好。